

目 录

导言 信息帝国的崛起	(1)
第一章 多面孔的信息主义	(7)
第一节 从日常表达达到学理主张	(7)
第二节 从社会观到世界观	(17)
第三节 从语形到语义	(21)
1. 英文语形之别	(22)
2. 社会观中的不同语义	(24)
3. 哲学内诸侧面	(27)
4. 更多维度:科学与人文及其他	(32)
第四节 信息主义与信息哲学	(35)
第二章 寻找新的“基石”	(39)
第一节 信息本体论	(39)
第二节 语言主义	(41)
第三节 信息“变”物质	(49)
第四节 万物源于比特	(54)
第五节 信息比物质更实在	(59)
第六节 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之间	(67)

第三章 以比特为基础的思考	(76)
第一节 信息认识论的兴起	(76)
第二节 “信息思维”:用信息“看”世界	(84)
第三节 比特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思考	(89)
第四节 “技术性大脑倦怠”及其他	(100)
第五节 从虚拟认识到情感计算	(113)
第六节 仅有比特是不够的	(123)
第四章 走向信息技术决定论	(127)
第一节 信息技术:历史功绩	(127)
第二节 信息技术:当代影响	(135)
第三节 多元汇聚的信息技术决定论	(141)
第四节 一种新的技术哲学范式	(159)
第五章 虚拟经济的魔力	(171)
第一节 虚拟经济的信息本质	(172)
第二节 从虚拟经济到金融决定论	(177)
1. 虚拟经济中的金融	(177)
2. 金融决定论	(179)
3. 金融决定论就是信息经济决定论	(181)
第三节 虚拟经济主导的(资本)信息主义	(187)
第四节 过度虚拟化的经济困境	(196)
第六章 追问信息	(208)
第一节 信息是等同于物还是有别于物?	(209)
第二节 信息是既成的还是生成的?	(215)
第三节 信息是自然性的还是建构性的?	(220)
第四节 信息是泛宇宙现象还是属人现象?	(225)
第五节 信息是本体论范畴还是认识论范畴?	(232)

第六节 信息究竟是什么?	(241)
第七章 信息哲学中的信息主义批判 (247)	
第一节 信息革命是否导致了全新的世界观?	(247)
第二节 信息世界观是否改变唯物主义的形式?	(253)
第三节 信息哲学是否带来了全新的哲学革命?	(259)
第四节 去掉信息泡沫之后	(267)
后记	(274)

导 言

信息帝国的崛起

信息时代，“信息”成为了一个十分耀眼的词汇和符号，以它为前缀或后缀的词组层出不穷，且个个闪烁着时代的光辉，令人景仰和追逐，以至于信息时代的来临，建造了一个“信息帝国”；抑或说，“信息时代”就是“信息帝国”的同义语。

“信息”的这种强势出场，与当代信息技术的问世并给我们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造成巨大变化联系在一起，信息技术的神奇功能使得“信息”也被附上巨大的魔力，成为能够“呼风唤雨”、主导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决定性要素”，于是我们似乎看到，无所不能的信息和信息革命，使得信息成为引导物质的力量、信息技术成为主导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信息文明在当代则引领整个人类文明，信息化导致了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文化兴盛……信息革命带来了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艳阳高照、莺歌燕舞……这就是信息和信息技术正在展示的神奇功能。由此导致一种“新社会观”乃至“新世界观”的形成，这就是“信息主义”。

可以说，在信息帝国崛起或信息主义兴盛之前，至少在工业社会时代，是“物质帝国”或“物质主义”占据着统治的地位。那么信息帝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物质帝国的衰落？是否意味着信息对物质的“霸权”时代的来临？

在一些人的描述中，确实可以看到物质的重要性似乎在信息的重要性面前消退；如果以前的年代是只见物质不见信息，那么信息帝国的年代似乎又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见信息不见物质，或物质被信息的泡沫所掩盖。

例如，经济领域似乎就显示了这种关系。信息经济的兴起使人们普遍误认为信息正在成为比物质、能源和货币资本更重要的资本，经济极大地依赖于知识、技术人才等信息资本，经济的主导性质从物质经济变成信息经济、从实体经济变成虚拟经济，从现实经济变成未来经济，从物品经济变成体验经济，从生产主义的经济变成消费主义的经济，而消费中又是所谓“符号消费”为主导……所有这些特征的变化，都被统摄到信息经济所带来的经济革命之中。随着信息经济的兴起，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从物质性的制造业转向了研发、金融、营销为主的虚拟产业，智力产业或知识产业成为经济的核心，它们均属于“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的范畴，在产业链中居于高端的位置，或者说知识的生产成为首要的产业，具有重大的价值，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功力，信息工作者成为中心人物；而体力劳动的经济意义退居次要，随之物质性的制造业主要由富集体力劳动者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并被发达国家视为“夕阳产业”，这无疑表明了经济领域中信息帝国的崛起是和物质帝国的衰落联系在一起的。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还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名言就典型地从经济上反映了上述的“新关系”，他说：“知识是今天惟一意义深远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即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没有消失，但它们已经变成第二位的。假如有知识，就很容易得到传统意义的生产要素。”^①

政治领域似乎也有这种迹象。政治强国在今天被赋予越来越

^① [美] 达尔·尼夫主编：《知识经济》，樊春良等译，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多的“软实力”成分，它们不再仅仅是追求从武力上征服殖民地，而是力求向他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即对他国公众的心灵世界产生文化影响，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攻心为上”（心理战）。这种征服心灵的能力说到底也是一种信息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信息不仅成为直接的经济力，也成为直接的军事力和政治力；“思想政治”日益成为一种更强大的政治。由信息实力构成的“软实力”似乎正在取代由经济、财富、物质资源、武装力量等物质实力所构成的“硬实力”，成为决定国家之政治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甚至作为政治争端的最极端化形式——战争——也成为由信息实力起决定作用的“信息战”。总之，信息是更重要的权力，是比资本更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一点也为系统哲学家 E. 拉兹洛 1992 年在题为《决定命运的选择》的报告中所精辟阐释：“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已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①

不仅对社会现象的看法从而在社会观领域中如此，而且在世界观领域中也是如此，这就是从过去强调物质实体为世界的基石，转变到强调“关系”、“结构”、“形式”等方面为世界的新的基石，并视“物质实体论”为传统过时的本体论或存在论，而后者则直接属于或本质上关联于“信息”范畴，从而意味着力求从物质本体论过渡到“信息本体论”，甚至将这种新的本体论或世界观直接表达为“万物源于比特”或“信息比物质更实在”，并将揭示信息的哲学特征的“信息哲学”置于“第一哲学”的位置，由此，“世界观信息主义”宣告问世，信息帝国的疆界也就从人间社会扩展至全部宇宙，信息主义也从一种社会学变成一种

^① [美] 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李吟波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7 年版，第 6 页。

哲学。

可见，信息主义是在信息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所作的一种非此即彼的“新”选择。

信息主义和任何社会文化思潮一样，其积极价值在于将原先被人们忽视的某种存在或现象凸显出来，引起人们的重视，使被注意力遗忘的角落被思想之光照亮，这就是使被“物质霸权”所压制的信息存在取得普世的关注。一个最简单的事例，在今天的生活中，人们如果一天不上网或不带手机出门，就会觉得缺少了什么，甚至处于不安和焦虑之中，似乎处于与信息世界的隔绝之中。这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感到的信息的重要性。

但信息主义也和任何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一样，所采取的往往是“矫枉过正”的手段来引起我们对信息的关注，这就难免走向极端，即过分夸大地去阐释信息的价值和功能，从而走向用信息压制其他存在现象甚至取代其他一切存在的价值的偏激之道上去，由此形成只见信息泡沫而不见其他一切现象的认识论景观甚至本体论图景。

在这种新的图景中，信息主义一方面将过去物质或实体优位时代被遮蔽的信息提高到引人注目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将信息推向“新的神坛”，使其成为耀眼夺目的现象，甚至泛起了被过度膨化的泡沫，大有“一飞冲天”之势，压倒物质甚至取代物质的地位，具体表现为：

信息的哲学地位：将信息从本体论上从属于物质的现象，变成独立于物质甚至可派生出物质的现象；从认识论上则将“信息思维”视为取代“实体思维”和“能量思维”的更合理有效的思维方式；从方法论上更是将信息看作是可以解释一切的“终极原因”；而作为这些的合集，就是所谓哲学因信息革命而成为信息哲学，使得哲学发生了一场“全新的革命”。

信息的社会学地位：信息尤其是信息技术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其中当代信息技术成为当代社会的性质和面貌的决定

性因素，成为社会文明的最高标志，形成“信息时代”、“网络社会”的称谓，信息和信息技术的魔力成为解释社会和历史的新的法则，社会变化的机制必须从信息世界或“信息方式”而不是从物质世界或“生产方式”中去寻找。

信息的人本学地位：信息成为解释和说明人的本质的新维度，甚至取代先前的一切维度被视为最有效、最正确的维度，从而更推广为生命的首要意义；各种“信息人”假说涌现出来，大有湮没先前的“物质人”、“生物人”、“社会人”的势头。

无论如何，信息帝国的崛起有其深厚的技术基础和心理基础，这就是信息技术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改变，即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这就是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生存”。我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数字信息和网络，也可以称其为数字化纠缠的无所不在，即“你不找信息，信息也会找你”。

可见，无论在日常生活的领域，还是学术研究的向度，信息问题从而信息主义都无时无刻不在“冲击”我们的感受和思绪。即使“信息主义”这个概念还未被每一个领域所普遍知晓和自觉接受，但其作为一种智力倾向正在兴起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具体地存在于各个学术领域中研究方法和观察视野上普遍的“信息转向”之中。这种现象的存在正是对信息时代的一种理论提升和哲学反思，也是“信息解释力”的必然扩张。在这种“时代性背景”下，我们必须对自己所置身的这个信息帝国有所认识，尤其是对信息主义有一种清醒而冷静的透视，在这个过程中，无疑也可以收获一些新的哲学思想，从而成为“当代新哲学”之浩浩长河中的涓涓细流。

本书叙述的逻辑是，第一章对信息主义的含义、多样性表现加以介绍，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对哲学信息主义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加以阐释，第四章转向作为社会历史哲学的信息技术决定论的分析，第五章集中对作为经济信息主义的重要现象——虚

拟经济加以专门的探讨，第六章回到信息主义的基本概念——“信息”之上，对其哲学含义再度加以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进入到对信息主义的评价性归结，这就是第七章的内容。

第一章

多面孔的信息主义

信息主义是信息帝国的世界观，它虽然已经形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但对其含义和表现形式则有莫衷一是的看法，其存在的历程和演进的过程遍及从日常生活到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也显示出一种从社会观到世界观的动态提升和扩展，从而带来某种新哲学问世的景象。

第一节 从日常表达到学理主张

一涉及信息主义，通常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信息主义？

简单地说，信息主义就是对信息的过度推崇；稍微复杂一点说，就是将对信息的这种过度推崇上升到学理的层面，通过一套理论表达出信息的极端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如果主要是体现在论证信息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价值，则可称之为社会观意义上的信息主义；而如果是体现在论证信息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和地位，则可称之为世界观意义上的信息主义。前者也可称之为社会学信息主义，后者则可称之为哲学信息主义。

学理上的信息主义通常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形成所谓的“朴素信息主义”，这就是对日常经验中所认识的信息及其重要作用加以简朴的概括和总结。

对信息的重视古已有之，但并不一定构成信息主义，像古诗中“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雁过故人无信息，酒醒残梦寄凄凉”；“荡子江湖信息稀，疲兵关塞肌肤裂”；“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等等，都表达了日常生活中对信息的渴求乃至赞美。稍进一步，在攻城略地和安邦治国的“大事”中，信息或信息手段的重要性更是早已被人们所体认，所以才有如下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中悦而诚服也”，“一言可兴邦，一言可灭邦”，如此等等。而当我们的古人用击鼓传信、烽火告警的方式来通知外敌入侵时，就标志了他们在实际需要的促进下不断“发明”种种能够迅速传递信息的“技术手段”，成为远古时代为实现远距和及时通信的一种方式，同时表明了信息和信息技术在通常的“军事活动”中的极端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为我们的古人所认识，也成为某种“普世”的共识，于是有了“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①、“一说客能抵千军万马”、“一条信息几乎可以颠覆一个政府”等说法。

即使我们不能称上述现象为“信息主义”，也可以认为这些都是采取了一种区别于“物质视角”的“信息视角”。以下是一个如何识别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的古老的思想实验，其中就体现了是采用“物质视角”还是“信息视角”的问题：

“特修斯之船”最早出自普鲁塔克的记载。它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

^①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40 页。

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哲学家霍布斯后来对此进行了延伸，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

一种解读：对于哲学家，特修斯之船被用来研究身份的本质。特别是讨论一个物体是否仅仅等于其组成部件之和。一个更现代的例子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乐队，直到某一阶段乐队成员中没有任何一个原始成员。这个问题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对于企业，在不断并购和更换东家后仍然保持原来的名字。对于人体，人体不间断的进行着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迫人们去反思身份仅仅局限在实际物体和现象中这一常识。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识别一个在物理构成上不断变化的对象，是根据其物质成分还是根据其“形式”、“结构”和贯穿其中的“精神气质”、“文化传统”？如果根据后者，就至少是更看重“信息”对于保持一个对象“是其所是”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这种视角和方法论就是信息主义的前身。

今天，“信息”已成为现代人的生命要素之一，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信息日趋紧密相连。如同维纳所说：“接受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外界环境中的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地生活着的过程”，“所谓有效地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要有效地生活就要有足够的信息。所以，正像通信和控制属于人的社会生活那样，它们也是人们的内部生活的要素”^①。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

^① [美]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陈步译，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9 页。

天都在与信息打交道，或者接收或者输出信息，我们从过去离不开与人的面对面交谈，到后来离不开报纸书信、广播电视，到今天离不开计算机、网络和手机，以至于“一关上电脑，你就觉得与世隔绝，总担心自己错过一些重要信息”^①。

甚至，即使我们想摆脱信息，在当今社会都已成为不可能，因为“你不去找信息，信息会来找你”^②。或者说，新的信息技术会对你的生活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它“延伸到社会生活几乎每一个领域，它甚至通过用于查询信息、娱乐、教育和启迪智力的家用电脑侵入家庭。公众通过‘世界游戏’和电子技巧参与规划未来的技术仪式，这是由传播技术带来的新型参与式民主演习”^③。这使得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包围、簇拥甚至“侵犯”，想过一种无信息或少信息的“原始状态”的生活，甚至也成为一种想摆脱现代技术而退回自然状态那样成为一种“梦想”。

我们不仅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还常常需要对信息的真假进行辨别，不时还会对信息真假难辨，在日常生活中陷于“两难境地”，以至于处在某种程度的“信息紧张”之中。下面的短文^④所叙述的故事就传达出这样的“信息”：

到底是谁动了我的信息？咱无从追究。每次遇上骗局，我总在心里冷笑，现在骗子的智商怎么就那么低呢？

前段时间，有一个外地电话一直往我手机里打，我每次都不接。后来这家伙改发短信，说他是重庆的，因为我帮他

^① [美] 盖瑞·斯默尔等：《大脑革命》，梁桂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② [美] 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③ [美] 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④ 流沙：《谁动了我的信息？》，《时文博览》2009年第12期。

们杂志写了许多稿件，评上了优秀通讯员，有五百元奖金，希望我把银行卡卡号告诉他。我一看，又在心里冷笑，说现在这骗子真是无孔不入。我回了一条短信：“奖金不要了，你们自己享用吧。”

那人回短信说：“那不行，这是杂志社给你的钱，怎么能自己享用呢？”

我想现在的骗子真是穷追猛打，不达目的不罢休啊。我把他的电话设置进了黑名单，终于耳根清净了。

大概过了一周，我收到了一个快递，拆开后，里面有两个信封，一个里面装了五百元钱，一个里面有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段话：“流沙老师，一直打不通你的电话，你为我们杂志写了那么多稿子，你不肯领这个奖，我们真的十分惭愧，我们杂志社财力有限，这点钱希望笑纳。”

我看罢真是哭笑不得，这回中奖成了真的。

就是说，某些方面的信息太多使得我们不再相信这方面的信息，但这样的态度又会使我们失去有价值的信息，于是，如何分辨信息泡沫中那微小的真实的部分、那剩余的沉淀物，就成为我们在信息的汪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类问题的存在也表明，即使我们不“投入”信息性的日常生活，也会“被卷入”这样的生活，甚至进入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生存”：在电脑和数字通信呈指数发展的今天，我们正奔向突发巨变的临界点，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信息都被数字化了，被简化为同样的“1”和“0”，我们就生活在“1”和“0”组成的一串串“比特”所代表的数字化信息空间中。在数字化空间中，人们将出现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这就是数字化生存方式。也就是说，信息生活方式已经是当今日常生活的主题。凡此种种，都表明当今社会的人们都在趋向于过一种“信息生活”，而一旦将这种重要性夸大到一定的程度，就有可能走向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主义。

对信息能力的重要性的强调也不时显现出信息主义的日常形态，如“声音大的有奶吃”、“强词夺理”之类就隐含着类似的主张。拿“强词夺理”来说，如果撇去其贬义的感情色彩，那么在实际社会中，强词就常常能夺理，或是不是“有理”，常常取决于是否拥有强词，或者理就是强词，谁有强词，谁就有理，以至于形成“事实胜于雄辩”的反义句：“雄辩胜于事实。”在这里，作为信息能力的修辞和表达能力成为决定一种观点是不是“有理”以至是不是“事实”的因素，而“权力”、“威信”等就是从中获得的。在现实中还常见“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情况，一般地说，这是信息表达的超常发挥，特殊地说，也是一种“表达决定论”式的信息主义，认为信息的效果唯一地取决于信息的表达而不是信息的内容。萧伯纳说过，Yes、No的写法只有印刷体和手写体两种，而说法却可以多到几千种，能表达出各种细微的差别。“表达决定论”导致社会形成一大类职业：以改善信息表达方式而取得所需要的结果，如律师、推销员、政治演说家，以及江湖骗子……所谓凭“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人，甚至把圆的说成方的。一定程度上，它将“知识就是力量”转化为“语言就是力量”；此时，事实本身不一定有什么社会性或群体性效应，而对事实的信息表达方式更能起决定作用，尤其是这种表达方式是否能够“煽情”往往成为最被看重的因素。这也说明，知识的价值，从而信息的价值，其实现过程还有赖于信息能力的系统发挥，如一个满腹经纶的人如果不善表达，则其知识信息就体现不出现实的价值。这同时还似乎说明，人是被信息表达方式所支配的动物，这至少是人的多样性的一个方面。

表达的功用也使我们看到，从度量上分析，“信息量”可分为“内容的信息量”和“效果的信息量”两种，后者也叫信息的效用量——信息所能改变信宿的信息状况的度量。信息的效用量的提出，使得信息的表达方式问题成为一个 important 问题，同样的信息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会获得不同的效用量，所以说说服力的重

要性，所以“宣传”和“传播”艺术的重要性，由此出现两个极端：效用量为零的信息如何看待？通过“炒作”而产生的效用量扩大的信息如何看待？后者实质上就是传播意义上的信息主义：只求传播的效用量的最大化，而不问信息的真假，也是信息主义的一种日常表现。

“信息的效用量”也使我们联想到日常生活中的“吆喝”。过去流传的说法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而今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能吆喝就不怕酒不香”或“吆喝能使酒变香”。下面的辩论似乎也“暗示”了这个道理：

2010年7月8日下午，“创想青春——2010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世博辩论大赛”全国晋级赛在中央电视台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演播厅举行，本场比赛的辩题是“打造城市名片，‘酒香’更重要还是‘吆喝’更重要”。反方……既巧妙避开了对方设置的陷阱，又成功压制了对方选手的发挥，如正方认为打造城市名片过程中“吆喝”要以“酒香”为基础，因此“酒香”更为重要，针对这一观点，反方选手首先承认了“吆喝”要以“酒香”为基础这一事实，然后对“吆喝”的内涵赋予丰富的思想，阐述“吆喝”具有指引方向、形成理念、凝聚力量和推动发展等强大作用，最后通过北京、张家界和纽约等城市的实例论证了“是基础”并不等于“更重要”，对于打造城市名片来说，通过“吆喝”可以传递出“酒香”，通过“吆喝”可以使酒更香，因此“吆喝”立足于“酒香”，又高于“酒香”，显得更为重要。

当然，更有甚者的“吆喝能使酒变香”的“吆喝决定论”或“忽悠决定论”，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表达主义式的信息主义。

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主义更因为“信息时代”的来临而凸显出

来。它不仅表现为对信息内容的空前重视和强调（像“知识社会”、“信息经济”等等的提法），以至于将工业社会的座右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转换为信息时代的口头禅“知识就是金钱，信息就是生命”；而且它还表现为对运载和处理巨量信息的当代信息技术的崇拜。今天，随着新的信息技术日益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世界，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主义日趋表现为某种形式的“信息技术决定论”或“媒介决定论”。基于计算机、通信及网络等人类处理和利用信息的手段，以其显著的效果和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造成了社会成员对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的神秘感，使得信息崇拜支配着社会成员及其思维和行为。无论是麦克卢汉在互联网时代来临前所说的“电视完全支配着我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①，还是网络社会崛起后尼葛洛庞帝所归结的“数字化生存”，还是从一般的角度上认为“我们对任何传播媒介的使用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它传播的特定内容。换句话说，媒介所能传输的东西——比如看电视的过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看的具体节目或内容”^②，这些都表达了日常生活中信息主义影响的无处不在。

波普尔曾提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或许可称之为“图书馆信息主义”。他说，假如我们所有的机器和工具，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只要“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显然，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我们的世界会再次运转”。然而，若是“所有的图书馆也都被毁坏了”，“我们的文明在几千年内不会重新出现”^③。图书馆是保存人类知识信息的地方，只要标志这些信息的图书馆存在，人类文明就存

^① [美]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② 同上书，第49页。

^③ [英] 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